

1001.2

河北文史资料

- 难忘的三年
- 回忆郝仲青先生
- 直隶督军李景林轶事
- 解放战争初期的张家口文化城
- 旧社会的保定娼妓

本刊今年第一期出版发行之后，许多文史同人和读者给予了热情的肯定与鼓励，这对于我们，是支持与帮助，更是鞭策与期望。

本期在刊行之时，正值中国共产党70岁生日。在《共和国足迹》栏目中，发表《周恩来视察伯延纪实》和《难忘的三年》2篇史料，权作纪念。周恩来总理1962年武安市伯延村之行，深入调查研究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，密切联系群众、关心人民疾苦的工作作风，充分体现了人民公仆的高大形象。胡开明同志记述自己三年困难时期，在张家口地区工作时不寻常的经历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老共产党员和职业革命家坚持实事求是原则、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品德和丰富的内心世界。读后令人赞叹，发人深思，颇受启迪。

《回首往事》栏目中，发表了刘仙洲回忆郝仲青先生、魏际昌回忆胡适之先生等文章，再现了一代名人的历史足迹和音容笑貌，弥足珍贵，读来饶有兴味。《人物春秋》栏目中有关乔明礼、李景林等人物的史料；有刘清玉先生谈宋肯堂将军在台湾的生活片断，读者从中可窥见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台生活状况之一斑。

本期新设《文化史踪》、《旧时黑幕》、《燕赵采风》专栏。前者再现了战争时期革命文化的发展与壮大；中者关于旧社会妓院和土匪的史料，旨在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，认识旧社会的腐朽与黑暗，从而更加热爱社会主义制度；后者2篇关于婚俗与丧俗的资料，则对了解和研究河北民俗文化很有帮助。

XXXXXX
编
XXXXXX

XXXXXX
者
XXXXXX

XXXXXX
絮
XXXXXX

XXXXXX
语
XXXXXX



河北文史资料

目录

●共和国足迹

难忘的三年

——困难时期我在张家口工作的经历 胡开明 1

周恩来视察伯延纪实 李栓庆 李成川 马文广 57

●回首往事

回忆郝仲青先生 刘仙洲 68

胡适之先生逸事一束 魏际昌 81

回忆军统特种训练班 侯仁寿 93

皇姑屯事件亲历记 冯亚东 99

●人物春秋

抗战中的乔明礼 丁建同 101

回忆父亲乔明礼 乔 皓 田盛文 106

直隶督军李景林轶事 王 恒 110

宋肯堂将军在台湾生活片断 刘清玉 120

金针大王王乐亭 王红舒 122

●史海存真

马厂兵营沿革 孙观义 董宪朴 曹洪彬 128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办

总编：李秉新 副总编：徐俊元 石玉新

戴安澜将军入缅抗战殉国记	李 颖	133
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●文化史踪

解放战争初期的张家口文化城	王维国	137
一文特殊的新闻出版队伍	肖 礼	147
忆第一部《毛泽东选集》的出版	曹国辉	155
丁玲与温家屯	刘 蔚	159

●旧时黑幕

旧社会的保定娼妓	郑亚非	162
昔日张垣“花界”一瞥	阎 书	168
回忆察北一带的土匪	郝在然 郝在安	174
坝上巨匪杨锡壶	张仲杰 郭 郭	180

●质疑 末科状元谁钦点	雨 丝	202
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●补白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受批评后的日记(80页) 侵华战争中日军伤亡数(105页) 陈嘉庚不留钱财给子孙(127页) 台儿庄大捷与周恩来建议(136页) 给毛泽东家定成份(158页) 宋教仁被刺破案秘闻(161页) 袁世凯杀人灭口(173页)

责任编辑: 杨小波 谢凤英 武永召

封面设计: 宋丕胜

难忘的三年

——困难时期我在张家口工作的经历

●胡开明

自荐赴山城——“暴雨”化“濛濛”——解放
干部——食的困惑——“六两”风波——对公共食堂的逆思
维——“草伴养”和“分户喂养”——核算单位放到
“脚”上——“鞋”要适合“脚”——参加华北农村座谈
会起因——上书前后

在修改这篇回忆录时，有的同志建议我顺便写写我的思想方法。我这个人，时常喜欢逆思维；就是人们对一种事物的看法已经形成主流的时候，我往往好从相反的方面多想想，不随波逐流，要独立思考一番；不唯上，不唯书，只唯实。我这样做，有时往往是孤立的，还会担一定风险。但是，历史总是公正的。

1962年，我在北戴河华北农村座谈会上“上书”给毛泽东主席。毛主席批评说：“河北胡开明，有这么一个人，‘开明’，但就是‘胡’开明……”在“文革”中，主席这段话广为流传，使

我在全国“闻名”。华北局一位熟悉我的主要领导曾跟我谈：“在党内有争议的时候，要站在多数人意见一边，不会有危险。逆多数人意见，错了，你就要负责任了。罪不责众嘛！”这话无疑对我是一种爱护，同时对我一针见血。

1956年，我当时是省委常委、省政府主管工业副省长。一次省委讨论两起生产事故。一起是宣化市下花园煤矿发生瓦斯爆炸，死了30多名工人。事故发生后，省公安厅派人进行调查，定性为政治事故。煤矿准备召开大会，让死者家属在会上对负责设计坑道的技术员进行控诉；并认为这次瓦斯爆炸是人为事故，理由是这个技术员是天主教徒，再则经过抢救此人活了。地区法院报请省高级法院要判处其死刑。省工业厅则认为是技术事故，将技术员撤职。宣化市委的意见是“有可能是政治事故”，理由是公安部长罗瑞卿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中，讲到反革命活动时引了下花园煤矿爆炸为例，并点了那位技术员的名。另一起事故是，唐山市进口一台机器，拆不开，一工程师用锤子砸开，把机器弄坏了，也定为政治事故，要追究刑事责任。

省委常委会上讨论给这两起事故定性时，多数人同意定为政治事故，我不同意。我原在察哈尔省工作，知道下花园煤矿是超级瓦斯矿，也就是说在瓦斯爆炸的高发区。干部都不愿意到矿上任职。记得有一个矿长受撤职处分，他却非常高兴，说：“这回可好，晚上总算能睡个安生觉了。”另外，这次瓦斯爆炸，连在坑道中的瓦斯鉴定员也没逃脱。那位设计坑道的技术员，听到瓦斯爆炸后，带头下井抢救，也中了瓦斯；如果是人为制造的，那他也就不敢下去了。唐山那位工程师拆进口机器不得法，造成损坏，也不能定为有意破坏。省委常委意见不统一，就采取签字的方式进行表决。常委们几乎都签了，第一书记林铁也签字同意定为政治事故；我没签字。事后，在一次省委常委生活会上，有的同志还以这个典例为由，给我提出政治警惕性不高的意见；我对

此当然持否认态度。时隔不久，我去北京向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反映此事。王对我说，罗部长在人代会报告中所举的一些政治事故后经复审，已经全部否定了。回省后，我即向省委做了汇报，这两个人都被释放了。所以，我总不愿意随大流；尤其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更不能唯上。就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挨批斗时，凡是说得不对的，我就摇头，当场进行解释。为此多受了些皮肉之苦。有的同志看我挨打可怜，就劝我：“就算不是那么回事，你不妨先承认下来，不少挨点打吗？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你也不懂！”

我听了只是笑笑，再挨批斗，还是照常。

自荐赴山城

1959年9月下旬，我和省委常委兼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裴仰山受河北省委委派，到张家口任指导整风反右工作组的负责人，同去的还有省纪委几名干部。张家口地处河北省西北端，条件艰苦，属于贫困地区，加上当时张家口市委班子出了问题，自己也知道此去担子不轻。

事情还要从在此前不久结束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谈起。这次会议的议题是传达庐山会议精神，然而，却采取了与以往会议不同的开法。首先给每个与会者发了一份彭德怀元帅在庐山给毛泽东同志写的信，让大家看。至于这封信是对是错，却没有讲。

我和省委组织部长张何明被分到张家口小组，和组里的同志一样，反复阅读这封不足4000字的信，并且对这封信的命运和让阅读这封信的目的做种种的猜测。

一天晚饭后，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约我和张何明出去散步。葛启问我们：“你们看了彭总的上书以后，发现了什么问题？”“问题？”我摇了摇头说：“看不出来。”“我也看不出来。”张何明回答。心直口快的葛启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我总觉得这个开会法有名堂。如果说彭老总的上书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那么

咱们都是一条道上的人，那他说的话我都说过，有的比他说的还重呢。”

听了葛启的话，我心头不禁一怔。对葛启，我是了解的。他对党忠心耿耿，工作兢兢业业，思想敏锐，敢于负责。也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。难道，彭老总的话真又要引起一场运动吗？

葛启的推理和我的担心果然成为事实了。

9月上旬，在省委一届八次全会上，省委点名批判了葛启，印发了《葛启右倾言论集》，组织与会人员对葛启进行批判斗争。16日，省委全会作出《关于葛启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》，指责葛启从1959年1月开始，“对党的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和省委直到中央，进行了连续地、越来越猖狂的进攻。这种攻击延续到7月，葛启在《大海陀》（内部理论刊物）发表文章和在市人民代表会上的讲话，达到顶点。”

葛启的文章和讲话，我早已读过。上面所提到的那篇文章是他为理论刊物《大海陀》所撰写的署名评论，题目是《坚持社会主义原则，认真改进工作作风》。其中有这样一段话：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：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，……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，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觉悟的水平这些客观存在的形势，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，想迟就迟、想早就早。我个人理解：由生产队（原高级社）所有制向公社所有制变化，也要有一个过程，也不能性急，它的变化迟、早、快、慢，同样也是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觉悟水平，不能只凭我们的主观愿望办事。”在谈到集体和自由问题，他认为两者是一致的。所谓大集体，不是没有自由，而是在集体利益一致的前提下，有更大的自由。应当肯定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日趋集体化，自由是越来越多，决不是越来越少。在总结工作中，既要看到九个指头，又不可用九个指头掩盖住一个指头，更不可夸大一个指头否定九个指头。

葛启在市人代会上，针对某些新闻记者一味猎奇，夸大其词，甚至无中生有编造新闻的恶劣倾向，辛辣地讽刺说：“他们认为说牛尾巴长在牛屁股上没希奇，非要说牛尾巴长在脑袋上才有新意。”葛启这些话，都体现了敢说真话的精神。

我对张家口和那里的干部，是比较了解和熟识的，为了解决反右倾中一些实际问题，尽快改变那里贫穷落后面貌，我经过反复思考后，主动向省委提出到张家口工作的要求。这个举动，使很多人难以理解。一是不理解高职低就。明明是副省级干部，偏偏要去当市委书记，这不是自己降了自己的职吗？二是不理解边陲“发配”。张家口和承德是河北的边陲区，那里自然条件差，生活水平低，在有些人看来，省里的干部只有遭贬才会被派到张、承地区，哪有自己要求“发配”的。三是不理解自讨烦恼。不仅葛启同志犯了“错误”，市委农业书记史万修也被打成“阶级异己分子”，整个张家口市委受到了批判和指责。在这种形势下，任何一个新上任的市委书记势必要受到上面与下面的各种压力。况且，这里各级干部我又是那么的熟识，这不是自讨烦恼？

针对一些人的议论，我和林铁书记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，居然说服了这位在河北工作几十年的老书记。

我说的第一条理由是感情。我在张家口工作多年。1945年8月，我军第一次解放张家口后，我就在晋察冀中央局办的《晋察冀日报》就任副社长；1946年10月，我随部队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撤出这座山城。1948年12月张家口第二次解放，我又是首批进城，担任察哈尔省委宣传部长、省政协副主席。1952年，察哈尔省建制撤销，当时华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找我谈：“察哈尔省撤销，使很多同志不安心工作，你是察哈尔省的老同志了，你先留张家口市工作一段，对稳定干部队伍会有好处。”这样，我就留在张家口市委任第一书记，半年后才调河北省委工作。这次如组织能批准我的要求，那将我是三进塞外山城了。这一条提得真

诚，记得林铁书记马上就赞同了。

我说的第二条理由是矛盾。我曾任省政府常务副省长，在1958年大跃进时兼任省大炼钢铁指挥部总指挥。这之前，我还任过省委工业部部长，对全省的工业实际状况比较清楚。所以，在讨论上报全省钢铁指标时，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，因之与省政府主要领导发生了分歧。一年后，全省所炼钢铁的实际数字又证实我坚持的意见是正确的。但也由此而产生了矛盾。其实，这完全是正常的。况且，在省里工作有矛盾，到张家口去工作就没有矛盾了吗？然而，从我自己嘴里讲出来，作为林铁不能不采取妥善解决矛盾的办法。

我说的第三条理由是责任。从我的潜意识来说，面对即将开始的反右倾斗争，张家口市委班子出了“问题”，自己原是察哈尔省的干部，对那里是人地两熟，自己去才能尽可能多的保护一些干部。这一条，虽然我没有多说，但林铁也是同意的。

还有一条，就是现在基层实际工作困难很多。我在省里工作，究竟下边存在什么问题？我想很有必要去实地主持一个地区的工作，全面调查研究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经验教训，扎扎实实地解决几个实际问题。

10月的张家口，已经开始感到了初冬的寒意。早晨和晚上，身体弱的人已穿上了棉衣。然而，此时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风暴已伴随着自然界的寒风，席卷着塞外的张家口地区。

“暴雨”化“濛濛”

我和裴仰山到张家口市后，首先在市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。传达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议精神。过了几天，我就顶着寒风去坝上大张北（大跃进时，将坝上张北、商都、沽源、尚义、康保五县合并为张北一县）。

我一进县委宿舍，就一眼看到了县委第一书记刘文达。我高

兴地喊道：“老刘！”没有料到，刘文达竟然连头都不抬。我有些生气地放开嗓门，喊了一声“刘文达！”喊声刚落，刘文达扭头就跑，一直进了里院的一间房子。我真生气了，就“蹬蹬蹬”追过去，一推门，里边插着，我伸出两个拳头，撬起门扇来。门开了，刘文达垂着头站在门边。我气冲冲地问道：“我是狼？我是老虎？叫你不应，追你就跑，还把门插起来，搞什么名堂？”

刘文达抬头看了看我，哭丧着脸说：“我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啦！”话刚说完，就嚎啕大哭起来。我说：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得见人哪！你说说，你犯了哪些右倾错误？”刘回答说：“我刚调来，情况也不了解，我也不知道自己犯了那些右倾错误。”

从刘文达房里出来，我又去找张文光，这也是我熟悉的一个老部下。正在县里主持工作的一位同志告诉我，张文光组织右倾反党集团，已被隔离审查。

“你组织了反党集团？”我开门见山问张文光。“是的。”“有什么事实？”“原来的县委领导做粮食生产计划平均亩产400斤。我说在坝上地区根本做不到，是浮夸，同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。后来刘文达来当第一书记，我又降低了他提出的指标。”“就这些吗？”“我们三个主管农业的书记常在一块讨论，反对高指标，所以不仅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，还被打成了反党集团。”“那到底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？”“平均超不过100斤。”

随后，我又去县城附近的海流图公社，见到一个公社副书记，这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村干部。我问他：“为什么把你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人家说我胆子小，暮气大，不敢放‘卫星’。”

次日，我又突然袭击，看了几个“高产”社队。

黄盖淖公社食堂，每人4颗焖土豆，一锅酸溜溜（草）汤，人们一口汤，一口土豆。而我见到的材料上，赫赫印着黄盖淖公社平均亩产410斤，创历史最高产量。

大囫囵村，刚刚秋收一个月，生产队、大队的库房只剩下一

个粮底子，社员家中几乎无存粮。而按上报的“卫星”，这里的粮食早已成10倍地超出了库房的储存能力。

狼窝沟村一户社员，孩子饿得直哭，母亲把干瘪的奶头塞进孩子嘴里，却挤不出一滴奶水。

难道这就是闻名全省的粮食高产“元帅县”？难道这就是出席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代表会获得表彰的典型？本来，在到张家口之前，对于这里的困难情况和反右倾问题，我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，但面前的现实已远远超过我的想象。

张北县地处内蒙古高原南缘，古长城以北，平均海拔1500多公尺。这里丘陵起伏，地广人稀，土壤贫瘠，气候干燥，风多雨少，十年九旱。冬季时常冷到零下30℃，地冻五六尺，立夏才能消融。有人作诗形容这里的气候和景象是：“狂风起处飞黄沙，少见行人不见家，晚秋未完冻先结，初夏不见桃杏花。”无霜期只有90多天，农作物生长期极短，产量低而不稳。1949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只有55斤。解放后，在党的领导下，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，粮食亩产平均达到100斤左右。

然而，在“大跃进”的浪潮中，张北县的主要领导在全省由上至下放“卫星”的影响下，在上级的一再催促和号召下，提出了“实现亩产400斤，争当粮食元帅县”的左倾口号。当时，也有许多人认为，张北气候寒冷，条件恶劣，这个指标达不到。但是，张北县委不但没有采纳，反而发动全县在全民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上，展开了大辩论。从党内到党外，从干部到群众，开展了两条道路、两种思想的斗争，插红旗拔白旗，大反所谓的右倾保守思想，促进了人们的思想“跃进”。只要看看墙壁上的标语，就能看出反右倾的“成果”：

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。”

“只有低产思想，没有低产土地。”

“天冷冷不住决心，地冻冻不住恒心。”

“苦干硬干拼命干，严冬寒春变夏天。”

为了实现“元帅县”，张北县和其他县一样做了很多“左”得可笑的事情：狗打死了，猫杀掉了，抓蛤蟆、捞蝌蚪、逮草鱼、找毛毛虫，为的是煮肉汤追肥，还将44000斤食用麻油和牛奶施在试验田、丰产田；农民的菜缸、水缸都被收去当尿缸，衣柜、衣箱则成为运送肥料的工具。

1958年10月，中央发出了召开社会主义建设先进代表会议的通知后，张北县委总结上报，采取的方法是：缩小耕地面积，多报粮食产量。全县放出了亩产莜麦3012斤，亩产马铃薯24000斤，亩产小麦1176斤，亩产蚕豆2600斤的高产“卫星”21颗。全县9万亩粮薯作物基本田，平均亩产412斤，比平均亩产81斤的1957年，增加4倍多。加上草粮田，粮食总产量达400000735斤，比1957年提高1.75倍。油料总产量达4038万斤，比57年增长88%，全县23万人，每人平均占有粮食1770斤。其实，这一年的粮食亩产只有110斤。

张北县委就是这样在“大跃进”“左”的思想指引下，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蛮干，急躁冒进，违背了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。虚报浮夸，瞎指挥，酿成了当年高产获奖励，翌年就闹粮荒的被动局面。然而，骑在马背上的“元帅”却下不了马。1959年又是浮夸，群众又是缺粮，恶性循环。

而这种一方面大跃进、放卫星，一方面闹粮荒的怪现象又何止一个张北县，一个张家口地区。我记得毛主席视察徐水时曾为徐水县亩产1132斤粮食吃不完发愁，而实际上，徐水人民第二年春天就开始吃糠咽菜了。山东给毛主席看了亩产4万斤的水稻田，亩产5000斤籽棉的棉花地。河南给毛主席看了亩产25000斤的玉米，亩产30000斤的烟叶。江苏给刘少奇委员长看了亩产10000斤的水稻，都受到了赞赏。

这就是那个从上到下都“发高烧”的年代。从毛主席到普通农民，都想尽快改变自己贫穷落后的面貌，但这只是善良的愿望而已，它违背了客观规律，结果只能是欲速则不达。

我想到这里只是焦虑。张家口的情况比想象的严重得多，全区70%的社队缺粮，寒冬已经到了，而很多社员还没有一件象样的御寒棉衣。“死宝变活财”、“砸锅炼铁”，搬空了人们家中的东西。浮夸风、高指标使国家征购任务成倍增加，而实际产量与征购数几乎相当，200多万人民生活没有着落。对这种情况，我感到很痛心。解放10年了，我们的人民还过着这样的日子，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没能带领群众脱贫，我们对不起人民。可眼下更糟糕的是，除了经济、生活上的困难外，还有正直、说实话的人正被当做“右倾”遭到批判。

葛启、史万修的问题我管不了，那是省委定案并报中央批准了的。整个“反右倾机会主义”斗争阻止不了，这是毛泽东同志发动的全党、全国性的大运动。但我几经反复思考，拿起电话、要通了市委书记处书记兼专员解峰，先是平和地叙述在调查研究中了解到的情况，并在心里告诫自己，“刚刚来，要小心！要谨慎！”但说着说着，我便不能控制自己了。当说到很多敢于讲真话、实话的同志正在被当成“右倾”受到批判时，我激动了，高声地说：“老解啊，下边的反右倾再不能搞了，这样搞，谁还敢说真话？我要在张北开全区的电话会议，宣布反右倾刹车！你能支持我一下吗？”

多年之后，解峰回忆当年接我电话时的情景说，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因为，老胡你是省委派来指导整风反右倾的工作组长啊！但张家口的实际情况解峰是清楚的。当时，解峰听到我的电话，很果断地表示：“同意你的意见和作法。”

电话会议召开了。全区上万名基层干部聚精会神地听着我代表省工作组和市委的讲话。一大批干部被解脱了。一场“急风暴雨”的“反右倾”斗争被化成了“濛濛小雨”。

解 放 干 部

1959年12月11日，中央正式批复，我任中共张家口市委第一

书记（编者注：张家口地、市区划曾有以下变化：1959年4月30日省委批准，张家口专区和张家口市合并，市委由原来的地委和市委组成；1961年5月29日经省委、省人委批准，恢复地委、专员公署，分建张家口市。胡开明同志开始任中共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，地市分开后又任中共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。）一时间，我突然觉得自己身上压上了一副十分沉重的担子，甚至怀疑自己这个常务副省长能不能干得了市委书记。但当我眼前浮现出一批批干部受批判的情景，浮现出饿得直哭的孩子时，一切顾虑即全打消了。

我开始从第二书记刘一鸣（我来前，曾代理第一书记）、以及书记处书记兼专员解峰、工业书记王云、城市公社书记张何明到一些县委和公社书记，逐个促膝谈心。我和解峰的倾心长谈是在去省汇报情况的路上和住招待所时进行的，话题是如何汇报批葛反右倾的情况。

在省委召开的情况汇报会上，解峰同志做主要汇报发言，对所谓葛启的错误，他显然是字斟句酌，十分慎重。但是，对葛启的称呼，他仍象过去那样一口一个“老葛”。中央一位听汇报的领导同志打断他的话，严肃地说：“不要老葛老葛的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实质上是敌我矛盾，只不过是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。”解峰沉默了一下，继续汇报。这回，不是称呼“老葛”了，而是改称“葛启同志”。敌会以后，我找到解峰，坦率地说：

“我同意你的称呼，葛启还是个好同志，怎么能划到敌我矛盾呢？这种形势咱们不必紧跟。”解十分感动地说：“老葛根本不是右倾。要说检讨，我和老葛都应该检讨左倾。这两年时间，我们脑子发热，办了极左的事。只不过在两次郑州会议以后，老葛对这一点认识得早，他想纠左，倒成了‘右倾’。你对张家口基层的反右倾斗争‘急刹车’，解脱了不少基层干部，但反右倾的大气候你是抵御不了的。”我接着说：“不光是老葛，还有承德的王克东、唐山市的刘汉生、省里的杨英杰，都不是右，是左，就是左得不如别人厉害罢了。至于反右倾的大气候，我一个人顶

不住，还有你，还有一鸣、何明、王云，还有全市280万人民，咱们要尽最大努力抵挡‘左’的干热风！”

有一次，我还找来了担任市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于力耕。这是个很有思想的同志，可是在批葛反右的风浪中，却变得小心谨慎，生怕由批葛而“殃及池鱼”，因为葛启的那些右倾言论很多都是出自他的调查汇报。

我对于说：“找你谈话，不是一般谈话，是和你谈心里话，真心话。你大概想，胡开明会不会抓我的辫子？你可以放心，我胡开明决不会抓辫子的，不抓你于力耕的辫子，也不想抓葛启的辫子。当然，你也不会抓我的辫子。说实在话，对葛启我早就反不下去了，因为他所说的那些话都对。我虽然解决不了他的问题，但我也不受批葛的影响。这就是我的心里话。”于听我说的话，连连点头说：“能！能！葛启虽然说犯了右倾错误，可他说的句句是实话。‘五风’刮光了社员的家产，有的社员家中只剩下一铺一盖、一碗一筷……”从傍晚谈到半夜，于详细介绍了全区农村的真实现状。我不时地插一两句话。

第二天，我又驱车来到了张北县，找到了张文光。我风趣地对他说：“我想听听你这个‘右倾机会主义分子’的高见。”张回答：“我说的还是‘右倾’言论。”我说：“那好啊，在反右的时候能听到‘右倾’言论可不容易呀。说实在话，我跑90里上坝，就是为了听你的‘右倾’言论。”

张文光抬起头，看着我真诚而又恳切的神情，才下决心说：“大跃进再也不能继续搞了。今年秋收前，张北全县234112人，就有213965人缺粮，占农业人口的93%，缺粮数达2889万斤。秋收后，缺粮问题暂时缓解了一点，但现在才过了三个月，离明年秋收还有九个月，而粮食已经吃得差不多了。明年的形势会比今年严峻得多。可是，直到现在，还有不少同志头脑在发热，还在叫嚷‘形势大好’，还在那里反‘右倾保守’，而没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，想方设法克服困难。这样下去，明年不知要

饿死多少人啊！”我一边听，一边沉思着。

张文光不知是怎么想的，说着说着话就象拐了弯似的自相矛盾起来。“我是犯了右倾错误的人，您上次来张北宣布反右倾列车，使我少受了很多批判。但处在现在的形势下，我的右倾帽子是摘不掉的，您也不必为我费心。我刚才说的尽是和大好形势唱反调的泄气话，谁处在您的位置上，也不会欣赏这些‘右倾’言论的。”说着，他痛苦得低下了头。我接着说：“张文光，你前面说得很好，可这几句话说错了，我欣赏的就是你能讲真话！你要是不敢说真话，那我就不为你费心了，可你还是说了真话。帽子能戴上去，就一定能摘下来，况且是顶不合适、不公正的帽子。你要相信党中央、相信毛主席，相信我们市委，振奋精神，准备继续为党工作。”

我在做广泛的调查研究。采取先实地察看，与群众交谈，再听当地领导汇报的方法；有时先听汇报，再去实地和群众中验证，这些领导汇报的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这样既是在考察干部，又是在纠正错误，寻求正确的方针政策。

在调查的全过程中，我唯一感到自慰的是，尽管处在“整风反右”的形势下，但是，仍有不少干部敢于抵制和批判“左”的错误，敢讲真话、实话。为了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，再不能让讲真话的干部坐冷板凳。在常委会上，我郑重提出了给张文光、刘文达、白玉等一批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”和定为犯了右倾错误的同志平反及安排工作的问题。

我说：“对这些干部的情况，大家比我更了解，更熟悉。我认为，这些同志说过这样那样的不时宜的话，但是，给他们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，是搞错了，搞过了。我们党历来坚持实事求是，如果搞错了，就一定要纠正，这不仅是解脱几个负责干部的问题，还在于使广大干部都能说真话，说心里话，恢复党内民主作风。否则，敢说话的人都戴上了帽子，那以后我们还怎么能听到真实的情况呢？我建议，该平反的平反，该工作的工